

有些人要不得 也有人是好样的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为纪念反清行动中于1911年3月29日牺牲就义、后合葬于广州黄花岗的72烈士，中华民国定其日为“青年节”，以表彰他们的爱国壮举，为后人追念敬仰。最近大陆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焦点人物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他维护宪法，议论时政，是典型的爱国者，却受到了学生的举报。校方的处罚和校园的冷漠，这些行为是可耻可悲的，其表现是“要不得”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三台长大，乃引用一句四川话“要不得”，去概括其行径的不当。

在理当享受学术和言论自由的举世著名的清华大学里居然出现了调教失当的学生，不能聆听思想开放、言之有物的教诲而深受其益不说，反而视其为“不当言论”，将其举报给校方。学校主管又欣然接受举报，邀许教授面责，并予以“停教”的处分。而此时此刻，数以百计的清华大学教授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三缄其口，对受迫受难的同事许教授不予声援。但仍有少数学者如郭于华、张千帆、杜学斌、郭凌虚等勇于抛头露面，仗义执言，要为许教授找回公道。用北方话讲，他们是好样的。

清华大学内举报的学生年少无知，接受了官方的宣传，将许教授爱国的言论视为“叛国”行径，或许有情可原。而清华大学的行政领导，置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清华学术自由的传统于不顾，下令许教授停教，就真是斯文扫地，不堪闻问了。清华大学绝大多数教授面临这一事故，置身事外，不加声援，是有惧于专制政权的淫威，其情可怜，甚行可悲！

许教授受罚的事件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纽约时报》于3月下旬刊登了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在言论和学术自由方面又增加了限制和压缩。如今针对清华大学正直敢言的许章润教授下手，停职禁教，是恶性反扑的粗暴举动……

尽人皆知的成语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许教授出于良知良能的正义之声，忧国忧民，放胆直言，代表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能量、有骨气、有作为。这也表示了中国的改革进步，注重宪法，为民服务要前进，要执着的方向。

该发言就发言固然是尽其在我，值得敬佩。该发言而不发言的沉默和迁就，往往成为助长和默认邪恶势力的温床。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希特勒在德国已大权在握，对国内犹太人的迫害已日见猖狂。当时，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视若无睹，认为自己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遭遇和自己不相关。最后希特勒不但变本加厉，在欧洲占领区普遍设禁犹太人的集中营，残忍处决六百万犹太人之众，并将德国变成“战争机器”，横扫欧洲，进攻苏联，让千百万德国人民在自己掀起的战火中无辜送命，让德国本土在盟军的战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推特图片）

轰炸下沦为废墟。德国人身临其境，深受其害，追悔莫及，醒悟已迟。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前美国纽约港和迈阿密港各到达了一艘满载犹太人的难民轮。那时美国政府要置身事外，减少麻烦，原轮遣返。这些人后来都被投入了欧洲犹太人集中营，死于非命。全球的犹太人都获得了自身曾惨遭围剿和求助无门的血的教训，在二战后奋斗自强，团结一致，不但兴建了以色列国，并以注重教育和极力参加公益活动为作法，在美国文教、财经等领域成为贡献卓越的族群。同时他们也是除恶务尽的真君子，成立了全球追捕纳粹逃犯的强大组织，在二战后数十年里把许多逃亡各国、埋名隐姓的纳粹战犯手到擒来，绳之以法。犹太人做事的精神和成效令人刮目相看。

英文有一句成语是：“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可译为，“我们命运一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许教授事件正是一个试金石，一面可提醒国人，事关重要，不可置之不顾。一面给中共当权者一个深思改正的机会，要重视宪法，提供人权。正所谓：“防民之口甚防川，言论自由吐真言。当局者迷要自醒，闻过则改勇向前。”

“因为这个修宪本身，不光是一个变相的终身制，同时也在思想上定于一尊。也就是说你不能再有别的思想，全都是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去年7月，许章润曾在网上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许章润在文章开头就强调，当下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全体国民对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产生了恐慌。他指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四大底线原则，包括基本治安、有限尊重私有产权、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和政治任期制。他批评中国向“文革”倒退，呼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对“个人崇拜”刹车、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平反“六四”。

今年1月，许章润又在香港媒体发表《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一文，批评中国不该走红色帝国之路。文中指出，“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极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才令四邻八乡猜忌”，奉劝中共“在和平落幕中华丽转身……告别专政”。